



ERTONG
WENXUE
YANJIU

兒童文學研究

10

7.8

I207.8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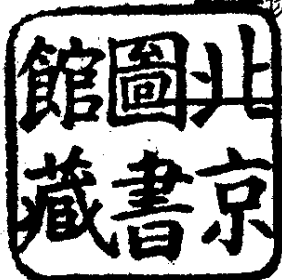
3:10

兒童文學研究

第十輯

目 录

兒童小說构思淺談	李楚城	1
小百花園丁隨筆	賀 宜	12
真實·積極·審慎		
——談兒童文學如何反映現實生活	黃云生 蔣 風	25
兒童小說中的“情”與“人”	趙元真	33
一顆顆愛國少年的心		
——蘇蘇的《小癩痢》及其他	楊幼生	37
在沃土上播種		
——評郭墟的兩篇獲獎小說	曉 石	44
致任大星同志		
——漫談《湘湖龍王廟》	汪習麟	52
趣味盎然的兒童生活圖景		
——讀《哭哭和笑笑》	郭景鋒	59
努力表現少年兒童的心灵美		
——談談陳麗的兒童小說	任 驍	67



A914075

一篇发人深思的小说
——评《闪亮的萤火虫》

雷群明 71

作家通信

匠心独运 出奇制胜
——与作者谈《三色圆珠笔》的构思

江 英 77

徐小冬们的苦恼、挣扎和希冀
——关于《三色圆珠笔》的复信

邱 勋 81

小雨点

要写好细节
“真实地再现”

黄亦波 86

达应麟 88

争 鸣

论辩品格、“左”的影响与评论质量
——再评赵耀堂、肖甦同志的评论

周 晓 90

儿童文学究竟应该写什么

刘崇善 97

作者谈创作

孩子们激励着我
三个和尚怎么办
从希腊神话中淘出儿童文学的金沙来

陈 丽 104

包 蕾 105

朱 彦 109

我和儿童文学

为孩子又拿起了笔

方轶群 115

黎锦晖和儿童歌舞剧	盛巽昌	123
为了未来的一代		
——抗战初期的《少年先锋》	张香还	131

高雅的幽默 梦幻的意境		
——读《爱丽丝奇遇记》新译本	周 鲁	137
从《小熊温尼·菩》谈英国的《菩书》	纪 民	139
寓言琐谈二题	李清民	141

编后记

简 讯

- 《小朋友》等刊物“1981 年度好作品”评奖揭晓
- 《儿童文学概念》即将出版
- 高校儿童文学教师进修班开学
- 《东方少年》创刊

封面设计 甘晓培

本期尾花 张志文

李
楚
城

儿童小说构思浅谈

假如花中有蜜 还要蜜蜂干吗

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是作家在孕育作品过程中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包括选取、提炼题材，酝酿、确定主题，考虑人物活动与事件进展的布局，探索最适当的表现形式，等等。作家在动笔之先，必须经过一番精妙缜密的构思。整个写作过程中这种思考都在不断进行。直到作品脱稿，构思才算最后完成。

构思在儿童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作品的成败优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构思是否精巧决定的。这也许是个写作常识。然而，即使普通的常识，往往也会被人忽视。

前不久，电影界就出现过一个口号：到生活里去找电影。

不错，作家不能关在书斋里凭空创造，以意为之。应该深入生活，去了解现实发展的进程，熟悉各种类型的人物，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进行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如果认为作家深入生活如同新闻记者采访报导材料那样，到生活里去就能找到电影，找到小说，那结果总是会令人失望的。因为生活中不存在现成的电影，不存在现成的文学艺术。生活是不会给作家这种方便的。

人们说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矿藏，说文学是镜子，都是为了说明生活和创作相互关系时使用的形象化譬喻。不能认为这个矿藏就像深埋在地层下面的煤矿那样，只要经过勘察与挖掘，拿来就是。

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经过艺术构思后创作出来的。作家很象蜜蜂。蜜蜂整天奔忙于百花丛中，辛勤地采集花粉，然后酿制成蜜。蜜来自花粉，但又不同于花粉。如果花朵中果真有现成的蜜，那还要蜜蜂干什么呢？

到生活里找电影之说，对儿童文学不无影响。有的作者创作儿童小说，只是死板地记录生活，不经过艰苦的艺术构思，事无巨细，把积累的素材一古脑儿塞进作品，造成繁杂冗长的弊病。而作者反认为这是真实地反映生活。这说明作者由于没有正确理解生活和创作的相互关系，所以不能充分认识构思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

玉不琢 不成器

浑金璞玉，虽然具有自然美质，但终究算不上是艺术品。这就叫“玉不琢，不成器”。树根竹节，却可以制成艺术珍品；或人或仙，或禽或兽，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这全靠艺术家的雕刻技巧和构思功夫。儿童小说的创作也是同样的情形。

我想就任大霖的《喀戎在挣扎》（载《巨人》1982年第一期）和夏有志的《钱！钱？钱……》（载《未来》1982年第一期）这两个中篇小说，谈一些关于构思的粗浅看法。

《喀戎在挣扎》是写工读学校学生梁一星的生活波折。梁一星在老师的教育感化下有了很大转变，决心“与昨天告别”，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不料正当报社记者写好报导稿预备表扬他的时候，梁一星却失踪了。他受到流氓分子要挟，被迫去参加一次殴斗。梁一星借这个机会对小流氓们进行劝解，设法制止这一犯罪活动，竟被为首分子刺成重伤。他在生命垂危之际，被老师和公安人员救回。结果凶犯得到惩罚，梁一星受到表扬。

《钱！钱？钱……》是写小学生王立涛的一场灵魂的搏斗。王立涛偶而发现一只暗藏的钱包，他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就从中偷拿了二十块钱。他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整天失魂丧魄，惶惶不安。他竭力设法摆脱这痛苦的精神折磨，可是窝藏那只钱包的罪犯发现了他，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企图拖他下水。王立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鼓起勇气，到派出所进行了揭发交待。他用实际行动洗刷掉玷污了自己心灵的污秽。

在现实生活里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没有戏剧性的情节，也说不上什么感人力量。如果是缺少敏锐观察能力的作者，未必会对这样的材料发生兴趣。可是任大霖和夏有志两位同志，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闪光的思想，发现了它的价值，经过精心构思，各自写成了新颖动人的中篇小说。两篇小说都写得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能激起读者的感情共鸣。他们在构思上的这种化平凡为神奇的艺术技巧，可以使我們得到有益的启发。

酝酿主题是构思的首要问题

文艺作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艺术形象的塑造所体现出来的主题思想，是作品的灵魂。它是作家经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经过对题材的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也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表现。具有深刻主题思想的作品，能使读者受到教育启发，作品从而获得生命力。所以作家在构思过程中总是把酝酿主题放在首要地位。

作品主题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是由作家的世界观和思想的高度决定的。往往不同的作家对于相同的题材，可以写出思想内容完全不同的作品来。一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不能由作家纯粹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外加进去，应该从题材中深入挖掘出来。作家在提炼题材的时候，首先要努力探索它所包涵的思想意义。

在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写犯错误的孩子思想转变的故事真是屡见不鲜。这类小说通常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新型关系的一般歌颂。情节各异，主题雷同，写得深刻感人能长久印在读者心中的为数不多。创作上的一般化倾向，是作者思想认识上的

一般化的反映。这是应该努力突破的。

《喀戎在挣扎》和《钱！钱？钱……》这两篇小说，写的依旧是这类题材，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它们色彩鲜明，各具特色，真是别开生面，表现了两位作家在艺术构思上的功力。他们在构思上的特色，产生于对生活的独特见解，能够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使读者得到新的启示。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中国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造成了无数的家庭悲剧，青少年一代受到残酷的精神摧残。在“四人帮”的思想毒害下，许多天真无知的孩子思想被搞乱了，是非颠倒，道德沦丧，不少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变成思想变态的畸形儿。直到今天，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依然是一项迫切的社会任务，为党和人民所关注。任大霖同志为此深入到工读学校中去，作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并把这些材料积极反映到儿童文学中来，表现了作家的政治责任感。在对现实生活进行分析研究之后，他发现在这些失足的孩子身上，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的和社会的烙印。他没有回避这些尖锐的社会矛盾，而是真实地准确地在小说中反映了出来，并形象地表示了自己的鲜明观点，这就使作品跳出了同类题材的小说所常见的一般化的窠臼。

作者在构思这篇小说时，巧妙地运用了希腊神话中马人喀戎为普罗密修斯作替身的故事，把梁一星譬喻为半人半兽的喀戎。当他一旦觉悟，就对以往的失足感到巨大的痛苦，这正如喀戎对普罗密修斯所说的：“我的上半身虽然长得英俊强健，可是下半身却永远是兽类的模样。这半人半马的躯体，给我带来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啊！伟大的先觉者，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才能使自己成为完全的人？！只要能做到，即使牺牲我的一切，我也愿意！”梁一星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以自己浑身的力量，跟自己作殊死的搏斗，要从这半人半兽的状态中挣扎出来。这就是这篇小说的主体和核心。

作者用蘸满感情的笔，描写了梁一星的坎坷命运。为了挽救成千上万的喀戎式的人物，他向社会发出了这样的呼唤：“是的，喀

我在挣扎，他需要爱，他需要勇气，他需要希望。救救喀戎吧，他会变成完全的人，真正的人！”这呼唤是如此深沉，如此扣人心弦，谁听了都会为之动容的。这正是这篇小说精神力量的所在。

《钱！钱？钱……》的主题思想也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作者敏锐地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人们灵魂深处的闪光的东西，把它反映到作品中去。在现实生活里就如同俗语所说的那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在先进人物身上也残存着旧观念的影响，须要不断克服。同样，不可救药的坏人也只是极少数，在许多犯罪分子身上也总保留着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正因为这样，所以法律规定对可以挽救的人都进行教育改造，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对于世界观尚未完全形成的少年儿童来说，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都会对他们发生影响，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都会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来。教育的任务，是扶植、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思想因素，帮助他们不断扫除心灵上的灰尘，使之成长为性格完美、情操高尚的人。

小说作者夏有志同志是有二十年教育工作经验的中学教师，他对学校生活和少年儿童的思想感情有深切的理解。他敢于正视生活中的矛盾，对小主人公王立涛的思想进行解剖。通过王立涛偷拿二十元钱以后的心理变化，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他为了战胜金钱诱惑而展开的一场激烈的灵魂搏斗。读完这篇小说，读者耳际会萦绕着作者的呐喊声：“为了维护你灵魂的纯洁，勇敢地拂去玷污你心灵的灰尘吧！”它会震动广大小读者的心，引起他们感情的共鸣。

读了这两篇作品会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发，写小说就如画家画像，小说的主题思想好比是人的眼睛，没有神采奕奕的眼睛，即使须发逼真，它也是没有生命的。

然而，关于儿童小说的主题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儿童小说的感染力量产生于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应该让读者在美的享受中潜移默化，优秀的作品往往看不出它的主题，甚至没有主题，强调主题的思想意义只会导致创作

上的概念化倾向。早在五十年代，儿童文学界就有过“主题在哪里”的争论，至今依然存在分歧。上述这种观点不免失之偏颇。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儿童小说的审美作用（这一点过去确实是强调得不够的），但决不能把它和教育作用对立起来。高明的作家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倾向深藏在艺术形象之中，使读者不知不觉受到熏陶，而竭力避免耳提面命式的赤裸裸的道德教训。但不能认为这样的小说就没有主题，没有思想倾向性，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优秀之作。至于概念化倾向，只说明作者的思想贫乏，艺术功力不足和脱离生活，却不是重视主题思想构思的结果。事实说明，《喀戎在挣扎》和《钱！钱？钱……》这两篇小说主题明确，却没有概念化的弊病。相反，如果抽去了它们的主题，它们就会苍白无力，难以打动人心。

题材提炼，要选择典型的人物和事件

文艺作品主题思想的酝酿，总是伴随着具体的事件和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进行的。准确而深刻的主题思想，必须通过生动丰富的材料才能体现出来。所以主题确定之后，还须完成题材的选择和提炼，方可动笔。正如清代戏剧家李渔所说：“基址初平，间架先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闲情偶记》）

创作题材来源于社会生活，是作家对生活素材进行选择、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作家提炼题材，类似于雕刻家对璞玉进行雕琢——把不合需要的部分全部舍去，让它的精粹突出地显现出来，造就出艺术精品。作家对待生活事件和形象同样要进行取舍，芟除繁杂，剪削枝蔓，保留其中精华，并进一步加以改造、组织，精制成艺术成品。

由此可见，形象和事件的典型性和概括性，是提炼题材的第一命题。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青少年的误入歧途都有自己独特的命运波折。有的由于发生家庭悲剧，失去了关怀和温暖；有的却是因为父母过分的溺爱，受到了纵容和包庇；有的纯粹是出于无知，

被坏人勾引、教唆；有的则是被生活环境逼迫，掉入陷阱。他们的失足，都有某种偶然的因素。这些都是常见的平凡而琐碎的生活现象，所以难以激起人们感情的波澜。可是这些生活素材到了任大霖手里，经过一番构思和剪裁，去芜存菁，熔铸成一个艺术整体，写出了《喀戎在挣扎》，就产生了很大的艺术效果。阅读这篇小说，读者仿佛被领进了一个山重水复，峰回路转的境界。经过一番饶有兴味的游历，有了新的发现，新的收获，感到不虚此行。作者的奥秘，就是着力于形象和事件的典型化。

小说的主人公梁一星，由于历史的曲折，一生下来就没有过幸福。他成了孤儿，差一点葬身狼腹。苦难的童年生活，锻炼了他正直、刚强的可贵性格。他向往光明幸福，追求温暖和爱，渴望和别的孩子一样进入如同仙境般的少年宫，得到享受快乐的权利。可是在那“史无前例”的荒唐岁月，生活对他如此冷酷无情，仅仅由于一次小小的反抗，这个才十岁的孩子竟被当作“阶级敌人的代理人”，要批斗、游街。入学以后，正逢上“批林批孔”，努力学习成了“智育第一”，温良恭俭让、尊敬师长、人性、母爱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货色。横行不法倒是革命造反的英雄行为。真理和谬误，光荣和耻辱，人性和兽性，美丑好恶被一古脑儿塞进了同一个捣臼，捣得个稀巴烂。在这种形势下，这个孤儿无力抵御严重的环境污染，终于被坏人拖下了水。他身上的人性萎缩了，兽性滋长了，每被“专政”一次，邪恶就增长一分。他的信念被摧毁了，在泥坑中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梁一星进了工读学校，已经枯萎了的人性的嫩芽获得了阳光雨露，才得以复苏。他开始了痛苦的挣扎，摆脱兽性，变成完全的人！

梁一星的命运沉浮，总是和社会的变化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就具有了时代特色和社会意义。他周围的“胖头鱼”、“橡皮鱼”、“黑皮”之类的社会渣滓，也都是在特定环境下孕育起来的畸形儿，他们既有自己的个性，同时又无不打上社会的时代的烙印，因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概括性。

对于生活事件也同样需要选择提炼。促成梁一星思想转化的

决定性因素是高磊对他的教育。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特意避免了同类题材作品所常用的手法：频繁的个别谈话，冗长的道德说教。（那样的写法，虽然可以强使人物转变，但不能赢得读者的信服，只会令人生厌。）作者似乎特别吝惜笔墨，只花了三千来字写了高磊给梁一星洗澡、敷药这件事。高磊讲的话全部加在一起还不满一百字，而且都是“把衣服脱下来！”“全部脱光，快点！”“动作快一点！”这一类与做思想工作毫无关系的话。可是就是这样一件事，给了梁一星巨大的震动，使这个本来怀着高度戒心和抵触情绪的小流氓立刻改变态度，他当众宣布：“喂，大家听好，从今以后，谁也不许说高老师的坏话，要不，我就对他不客气！”就是这句话，宣告了梁一星转变成长的开始。

洗澡这件事本来是生活中的日常琐事，经过提炼以后却如此曲折动人，充满戏剧性，富有吸引力。梁一星被叫到值班室之前，刚吸过烟违反了校规，他断定这次免不了要挨一顿死揍。所以高磊命令他脱光衣服时，他表现出一种挑衅的姿态：“来吧，叫一声痛就不是人！”甚至想在逼不得已时，就用暗藏的匕首行凶。他听到哗哗的放水声，偷看到小间里蒸腾的雾气，又认为这是一种新创造的什么残酷的刑罚……气氛越来越紧张。及至高磊把他推进浴缸并帮他细心擦洗，在洗净了他肌肤上的污垢后又给他的疮口敷药时，长久潜藏在心底的正常感情一下子被唤醒了，他想起了妈妈，感到了温暖。经过连续四次的洗浴治疗，不仅机体恢复了生机，也恢复了已经丧失了的信念和自尊。

高磊是位真诚的教育家，他认为塑造人的灵魂犹如建筑高楼大厦，需要粘合剂，这粘合剂就是爱，深沉的爱。在给梁一星洗澡这段情节中，具体体现了这种教育思想。他对走入歧途的梁一星没有鄙视和憎厌，而是充满同情和爱。正因为高磊具有这种崇高感情，才能从梁一星的一个细小动作中发现了长期折磨他的皮肤病，马上给他洗浴敷药，消除他的痛苦，开始建立起师生之爱。这么一段情节容量很大，描画出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了丰富的思想感情，说明作者具有很强的概括能力和高明的构思技

巧,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创作经验。

结构布局,必须从塑造形象出发

有了正确的观点和丰富的材料,还要有恰当的表达方式,才能把材料熔铸成一个艺术整体,供人欣赏。因此,小说的结构布局,故事情节的铺展,主线与分枝的联结、穿插、疏密的安排,虚实的交叉,等等,也是小说构思中要精心考虑的问题。

小说是写人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通过事件的描写,所以说,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由此可见,小说的结构布局,情节的安排,细节的运用,都必须从塑造形象出发。《喀戎在挣扎》和《钱!钱?钱……》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喀戎在挣扎》是以小主人公梁一星的思想转变作为小说的主要线索来描写的。对于已经堕入了罪恶深渊的梁一星来说,要真正做到“与昨天决裂”,做个完全的人,必须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小说要具体描写出人物性格的这种艰苦曲折的发展过程,确非易事。作者完全舍弃了参加“忆苦思甜”、参观展览会、个别谈心之类的俗套,只是利用了一把匕首作为道具,经过巧妙安排,通过梁一星对这把匕首的几种不同处理,生动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发展。

梁一星是抱着“对着干”的心情进入工读学校的,很快成了学生的头头和闹事的领袖。他腰间暗藏了一把匕首,如果老师对他太“辣”,使他感到不能忍受,他就会毫不迟疑地使用它,并且随时逃跑。进校不久,高磊给他洗澡敷药,治好了他的皮肤病,使他的感情起了重大变化,当天就把匕首转移到床板的木缝里。这标志着梁一星对待高磊的隔阂虽然存在,但明显的敌意已经消除。又过了半个月,梁一星经过对高磊和对工读学校的进一步观察,感情起了更大变化,这把匕首又从床褥底下转移到气窗下面的墙缝里,并用石灰封好,拿取更不方便,说明他开始安下心来,暂时不准备逃跑了。可是后来由于梁一星和张阿兔打架,高磊没弄清真相,就给了他当众处分,严重刺伤了他的感情,结果,这把匕首又被梁一

星取走了。这标志着他的野性复萌了。梁一星因遭受委屈，病倒了。高磊亲自给他喂饭，并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梁一星第一次感动得扑在高磊怀里大哭起来。三天以后，当梁一星以全票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时，他终于自动交出了匕首，并且写了作文，坦露自己的感情：“过去，我不相信有‘爱’这个东西。人和人就象狼和狼一样，谁比谁狠，就只能被他咬，咬死活该。这半年多的生活，使我认识到：我错了。世界上有爱。……”

作者通过对这把匕首的精心安排，不仅展现出梁一星思想感情的跌宕起伏，而且又精细入微地刻画出高磊的可敬可爱的形象。梁一星第一次脱衣洗澡，高磊就发现了他腰间的匕首。如果当场突击搜查，梁一星就会当作恶性难改的罪犯押送少年管教所，被作为敌人对待。要毁灭一个灵魂容易，而挽救一个灵魂却难。高磊佯装不知，并严守秘密。以后这把匕首每次转移地点，都被高磊发现。他以教育工作者高度的责任心和对梁一星不幸命运的深刻同情心，密切注意着这把匕首，探索梁一星感情的微妙变化。他把这把匕首看作是横隔在他们师生之间的一堵冰墙，决心要让它自动崩溃。他相信爱的力量可以把它溶化掉，并把梁一星的那颗变硬了的心仍然变得温暖而善良。正是他的火热感情和艰苦的工作，教育感化了梁一星，挽救了他的灵魂。作者塑造了一个党的教育工作者的形象。一把普通的匕首，竟发挥了一以当十的奇妙功能。

这篇小说描写了梁一星的一生经历，反映了他性格发展的波折，但没有像传记体小说那样按照时间顺序平铺直叙，而是截取了从梁一星失踪到抢救回他的生命这一生活片断，构思成一个推理小说那样的曲折故事。作者很少正面描写主人公的活动。小说写到三分之一，梁一星方才出场，但这时他已处在生命垂危之中，连语言能力都没有恢复。对于梁一星的生活经历，主要是在追寻和抢救梁一星这一基本情节的描写过程中，通过对高磊的心理描写，作者的倒叙，梁一星的幻觉等等电影手法介绍出来的。如此众多的材料，处理不好就会显得繁杂累赘，淹没了基本情节。可是作者

紧紧抓住梁一星的性格发展的脉络，进行布局，合理地调动、安排情节，虚实交叉，繁简得当，把故事的基本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这两条线巧妙地扭合在一起，读来贴切自然，而且显得波澜起伏，富于变化，有很强的节奏感。

比较起来，《钱！钱？钱……》的情节要单纯得多。作者没有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而是着力于人物心理状态的描写，展示出小主人公灵魂深处光明与阴暗的激剧搏斗，同样使作品富有戏剧性。

这篇小说里运用的材料，很多都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的身边琐事。如王立涛到小摊上买零食吃，本来没有多大意义，可是结合着人物的内心活动，就具有了喜剧性质，在塑造形象上充分发挥了作用。

这篇作品中选用的材料，有些都是互不关联的孤立事件，没有呼应，好像是若干未经串联的珠子那样。然而，它们都是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选取的，经过人物感情变化的红线串联以后，就结成了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

作者不只是描写王立涛的怯弱、自私，同时也选取了帮助无钱求医的病孩小英，偷偷塞钱给正在急难之中的邻居李艳等情节，表现他善良的向上的感情，并且写出它们之间的殊死搏斗。写的虽然都是儿童自己的日常生活，但显得多采多姿，有起伏，有节奏，整个布局和谐自然。

巴金同志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和文学》）这是非常深刻的艺术见解。实际上无技巧就是最高的技巧，如同清代画家石涛所说：“无法而法，乃是至法。”这样的作品不受创作规则的束缚，自然天成，没有斧凿雕琢的痕迹。儿童小说的艺术构思不应该有什么固定程式和框框，研究别人的成功经验，是为了从中吸收营养，化成自己的风格，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而不是要照抄照搬，框住自己。有位学者说得好：作家平时要读破万卷书，而动笔时又要犹如未读书，就是这个意思。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

小百花园丁随笔

贺 宜

为孩子们写的

谁都知道儿童文学作品是给孩子们写的。这是普通常识，当然不会有异议。

可是，看一看许多具体作品，就会觉得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了。我们惊奇地看到，不见得所有的作者都是在认真为孩子们写东西。

要说他们反对为孩子们写作，那是没有根据的。他们不是宣称自己在为孩子写作吗？他们不是把作品发表在儿童报刊上吗？那么，为什么有些作品竟受到小读者的漠视甚或拒绝呢？

小读者是最公正的，是最真诚的。他们一般并不注意作者的名字，只问作品是不是吸引了他们，是不是能打动他们。当然，如果某一作者的作品让他们有了较好的印象时，他们也会经常注意报刊上有没有他的作品，而愿意优先挑选他的作品来读。反过来，假使他对某作者的作品印象不佳，下次看到他的新作时，可能会跳开不看，或者放到最后，用姑且试一试的心情来看。这不能怪小读者爱挑剔，怪他们学习态度不对头。应该反躬自问，我们作者自己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所以，如何使小读者们乐意接受你的作品，也是作者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给孩子们写东西，不论写什么，总得注意一件事，那就

是要问一问：我写的东西究竟会对他们起什么作用？这一条万万马虎不得！这就是注意教育影响，或者照流行的说法，叫做注意社会效果。

有些作品对成年人说来，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副作用，可是一到孩子手里，就发生问题了。例如电视片《加里森敢死队》和《姿三四郎》，成年人看看，并没有什么突出的问题，可是小观众一看，就出了许多乱子。有许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存心要毒害孩子的人到底是很少的，问题倒在于我们有些作者，自以为一片好心，要给孩子们一些什么好东西，结果效果却适得其反，这是不乏其例的。究其原因，还是作者自身的艺术观和世界观在起作用。

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是不可分的。儿童文学有个教育性的问题。在其它成年人欣赏的文艺作品里面，虽然也有教育性的问题，但是儿童文学较之其它文艺作品在这方面特别显得重要，这是由于少年儿童正处在各方面成长的阶段，无论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与他们接触到的人物，都会对他们发生不同程度的教育影响。

谈到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强调这一点没有好处，甚至有人说，一讲教育性，儿童文学就完蛋了。说是儿童文学创作只能遵循生活发展的规律。生活是怎样，儿童文学就应该怎样写。我觉得如果不提教育性，这话就片面了。把文学性和教育性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似乎一讲教育性，就会导至取消作品的文学性。这是过虑。艺术上不成熟的作品有的是，但是过错不在讲了教育性。这是作者生活不足和缺乏艺术才能或艺术表现力不够的问题。

教育性不但不排斥文学性，刚巧相反，艺术性越强，作品的教育作用越能充分发挥。教育性正存在于强大的艺术魅力之中。有些作品教训满纸，面目可憎，这并不说明作品的教育性太强，以致把艺术性挤走了。而是艺术性太差，作者不懂得通过艺术形象来教育、感染读者，而只知道求助于赤裸裸的教训来进行说教的缘故。这种令小读者意兴索然的说教，并不是加强了作品的教育性，而是大大地削弱了教育性。所以认为强调了教育性，就会降低作